

影響情感與財務支持連繫的因素*

熊瑞梅**

這篇研究論文是用臺灣全國性的調查資料，探索出影響1228個情感的或財務支持連繫的因素。研究發現提供支持者的特質及關係維繫之機制比需要支持者的特質更明顯地影響了情感或財務支持連繫形成的機率。性別和教育代表不同的位置資源。男性傾向於提供更多的財務支持，而女性傾向於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高教育者較傾向於提供情感支持，而低教育者較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關係內容，連繫強度，及支持需要者及提供者特質的相似性是關係維繫機制的成份。在臺灣，影響不同支持連繫最重要的變項是關係內容。一般親屬較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而非親屬較傾向於提供情感支持。親屬對財務支持連繫的影響較Wellman and Wortley (1989, 1990)為大。在臺灣父子軸，兄弟姐妹軸，及其他親屬軸全顯著地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較提供情感支持的機率高。

一、研究的問題

二、文獻探討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結果

五、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的問題

人們日常生活的相互支持行動是不可避免的。有社會科學家將社會支持視為社會資源，同時認為不同類型的社會支持行動形成的結構基礎不一。在此方面的研究當以Wellman (1988)做的最深入完備。Wellman在探討人們的

* 本論文之完成首先要感謝伊慶春教授之邀請，使本人得以參與國科會資助的82年2月社會意向調查(NSC-82-0301-H-001-054-B1)，同時也感謝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集刊兩位評審者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 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

支持行動是由網絡觀點出發，他認為人們是生活在網絡的世界，日常生活各種支持行動提供者的集合便成為人們的支持網絡系統。人們日常生活支持網絡中有些成員能提供多種支持，而有些支持傾向由某些特定成員提供。例如父母配偶往往是提供情感支持、日常生活小幫忙及財務支持的網絡成員；而同伴支持較傾向由朋友提供。

社會支持的研究過去均強調身心有問題者所獲得的支助，及社會支持對身心健康的影響。這種觀點是屬於功能觀，亦即社會支持對解決社會問題及社會整合是具有功能性的。然而若從結構分析觀來透視社會支持行動，社會支持行動則被視為鑲嵌於社會網絡的社會資源。社會資源的取得是立基於日常生活社會關係網絡建構的結構限制與選擇；例如一個人在社會階層及生命循環階段的位置會限制一個人建構社會關係網絡的大小及網絡異質性，雖然同一結構位置者結構機會限制可能差不多，但個人仍然有自由選擇建構社會網絡的空間。

人們為何會與人維持連繫？人們會因為生活中的角色關係產生個人連繫，例如有連繫是因親戚、同事、鄰居、同學等角色關係而形成的；但所有的連繫未必是能提供支持資源，一旦連繫成為支持資源，連繫便更加穩固。連繫可說是人們應付日常生活，把握機會，及減少不確定性的社會資本(Kadushin, 1981)，這也應驗了中國人常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說法。

人們日常生活與社會連繫社會支持是息息相關的，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但一個人所形塑的個人網絡的特質、大小、組成、密度如何影響支持資源在其中流通的狀況，卻是很少人熟悉的，Wellman and Wortley(1990)將各種支持視為資源，特別關懷這些資源如何鑲嵌在社會網絡中運作(Granovetter, 1985)。

Wellman and Wortley(1990)在解釋社會網絡與社會支持資源之關係，他使用關係的(relational)，結構的(structural)及個人特質三個層面或混合式的角度去詮釋之。關係面包括了連繫強度及兩者接近的可能性；結構面包括互

動密度及親屬組成，網絡成員互動密度大，代表支持網絡的凝聚力強，有如支持羣體；網絡親屬比例的多寡代表親屬規範義務觀的強弱感。個人層次面包括網絡成員的位置資源，及兼具個人特質及關係面意義的兩者特質的相似性。

本論文由於調查資料缺乏網絡結構層次之資料，故在分析影響不同支持連繫時所使用的解釋架構祇放在個人與關係層次。個人的層次包括支持行動需要者特質、支持行動資源提供者特質，關係層次則包括關係類型、連繫強度及同／異質性。

二、文獻探討

有關社會支持的研究大多把研究重點放在社會支持之測量、及社會支持對心理衛生、幸福、或壓力之影響(Aneshensel and Frerichs, 1982)。

House(1981)認為社會支持的測量應掌握整體脈絡現象，亦即應掌握人們遇到哪個問題，誰給誰什麼支助的整體脈絡內容。他將社會支持的形式用來源與脈絡矩陣(source-by context matrix)定義之。在這個矩陣中支持的來源包括配偶、其他親戚、朋友等社會關係連繫。脈絡亦即支持行動的內容，其包括情感的、評價的、提供訊息的、及工具性的支持。

Perlin(1984)將網絡、小團體、及人際來源(interpersonal sources)視為社會支持的成份。其實三者均是由關係組成，只是定義的條件限制不一。網絡是個人可接觸的關係集合，小團體是個人最可能尋求支持之社會關係，社會支持之人際來源則強調人際關係之品質，例如信任或親密的關係。

Lin(1986)認為社會支持代表維繫提昇人類之社會力量，這個社會力量包括各種層面的社會關係與社會互動。作者的社會支持定義將社會支持分成兩種定義。第一種定義是融合過去十年社會支持研究之定義，第二種定義是依照社會資源論演繹之。前者用歸納法，後者用演繹法。

Lin(1986)認為社會支持有兩個成份：社會與支持。社會成份包括人與環境的連結，連結則意涵三個層次的關係：社區的、社會網絡、親密與信任的

關係。支持的成份包括情感與工具性的活動。同時他指出研究者也應該區分知覺的與實際的支持，前者是個人對支持的主觀評價，後者則是個人的客觀支持經驗。

Lin(1986)認為一個人透過親屬關係、工作場域、及各種社會環境所建構的關係連結(linkages)比主觀的社會支持評價測量要好。因為社會連結是由人們較穩定的社會關係結構中產生出來的，故對人們有較高的結構限制力，同時也是較易使用或可進入(accessible)之關係資源。在人們可使用或可進入的網絡資源中最核心的部份是親密信任網絡。這個親密網絡的關係傾向於來回且雙向的交換、彼此分享幸福及責任。

Lin(1986)提出社會資源與社會支持關係之理論假設。他受到Granovetter(1973)的弱連繫假設之影響，同時他主張支持行動必須更具體地指出行動者使用社會連繫之目的。故他大致將使用社會連繫之社會行動分成情感性與工具性之行動。最後他更進一步地關懷人們在尋求社會支持時所使用之連繫強弱與連繫所擁有之資源和支持行動之關連性。他認為能接近或使用強且同質性的連繫有助於心理健康或情感性支持行動，而能接近或使用弱連繫且資源豐富之連繫有助於工具性型行動目的之達成。

前述在社會支持研究上均有重大貢獻者將重點放在社會支持的測量及功能上，較少從不同支持行動連繫形成的影響因素來探討。Wellman(1981)及Wellman and Wortley(1989, 1990)用個人社區(personal community)的概念來掌握一個人完整的社會支持行動體系。他們的個人社區理論不但影響了都市社區關係理論，同時對人們日常生活各種支持連繫組成之網絡結構層次及二者關係層次(dyadic)之分析有特殊之貢獻。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驗證社會支持的理論，而是想藉著不同支持行動組成之網絡及連繫特質來了解社會關係結構及關係連繫形成之基礎，故Wellman and Wortley(1989, 1990)的文獻便成為本研究最適合參照比較之觀點。

個人網絡的觀點用在社區關係及支持行動體系的分析上，在理論上及方法上均貢獻甚大。過去不論是社區關係或社會支持的研究，所掌握的資訊祇

及「在社區中認識多少人？親屬多少？非親屬多少？」或「誰幫助了你那些事？」這些問題祇關懷關係或支持模式靜態的結果，但這些與你在社區中有關連的人們，或支持系統的人羣，他們之間彼此的關係為何？緊密結合？或鬆散結合？他們之間關係建立的基礎為何？這類問題過去較被忽略，但較能精緻地探索社區關係及支持行動系統形成等理論建構的基礎。

個人網絡用在社區關係及支持系統的研究，對都市化及社區關係影響的解釋，產生新的詮釋。傳統社區關係的測量方式，促使社會學家朝向都市化會導致人際疏離的假設做驗證(Kasarda and Janowitz, 1974, Hunter, 1975)。個人網絡的研究觀點，不但駁斥都市化與社區關係衰敗的說法，且一再地發現在都市中，人們爲了對付陌生的公衆領域(public area)及世界的冷漠，往往建構了同質性高且具多重強連繫的鄰里社區，此類社區多半是都市內的少數或移民族羣社區(Gans, 1982)，故有人主張社區並未消失，反之有些族羣在努力維繫它，亦可稱社區保存論(community saved)。上述將個人親密網絡侷限於鄰里範圍內者多半是資源有限的少數民族及工人階級。反之，有人主張當社會愈來愈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且多元化時，人們會傾向於將私有關係超越社區鄰里空間的限制，由於交通通訊的發達，私密關係網絡雖散佈較遠且不同之處，但透過電話聯絡，距離變得並非障礙，這種多元化的網絡組合且超越空間距離限制的私人網絡建構方式亦稱社區解放論(community liberated)。社區關係不是普遍衰敗，祇是不同人因應都市化的結構變遷，在建構個人社會網絡時採不同模式(Fischer, 1977; Wellman and Leighton, 1979; Wellman, 1988)。

將個人網絡用在社區關係及社會支持的研究，在西方甚多(Verbrugge, 1977; Wellman, 1982; Fischer, 1982; Marsden, 1987; Van der Poel, 1993)。其中最著名的當屬Wellman，他由早期對社區關係衰敗、保存、解放的爭論，漸漸關懷支持行動的社會資源觀，近年更強調先進工業社會郊區化的結果，人們社會關係越趨私密化的現象(Wellman, 1992)。

Wellman(1979, 1990)企圖跳出傳統社區研究的地方社區連帶觀，而強調

個人網絡的社區觀。前者的觀點強調社區的整合規範觀，而後者強調的是不受地理親近性限制的個人網絡結構分析。地方社區連帶規範觀者在做研究時是用個人對社會整體互動的認知與態度做為指標(Wellman, 1991)，在方法論上是方法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亦即用個人對整體結構的看法代表社會結構的整合程度。事實上，社會結構的具體行動體系之結構密度、連繫與社會行動基礎均完全被忽略。他為了落實網絡結構的分析，先後在加拿大多倫多附近的 East York 進行一次大型調查及深入訪問。

Wellman 在 1968 年做第一次調查時，他隨機抽樣 845 位居民，要求居民提出至多六位居家以外的親密連繫(intimate ties)。在第一次調查中他僅對此親密連繫所形成的網絡結構及支持行動類型做簡單的調查。這份資料缺乏提供支持者的個人結構特質資料，以致於不同結構位置者是否意謂著能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持資源則不得而知。故於 1978 年再就原樣本抽選 33 位做完整且深入的訪問及質化與量化的分析。

在 Wellman 的分析中包括了兩個層次的分析：網絡的層次及連繫(ties)的層次。網絡的層次分析包括 33 個網絡，而連繫的層次分析包括 403 個連繫。在連繫層次的分析中，最困擾的連繫是夫妻，夫妻是不同獨立的個體所建構的連繫或夫妻是一體仍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在 Wellman 的研究中，夫妻連繫提供較多的同伴、情感、及財務支持資源；已婚者的網絡連繫中高達 35% 的連繫是夫妻連繫，唯恐夫妻連繫干擾分析效果，故在 Wellman 的統計分析中剔除了夫妻連繫。

在臺灣過去有關社區關係及社會支持網絡的研究(伊慶春，1985，1988；孫清山，1979；章英華，1988；黃清高，1985a，1985b)多半是祇知關係的大約人數，或支持關係的類型，但這些關係人的特質、連繫及網絡等資料則完全缺乏。

在臺灣使用個人網絡的研究有孫清山與熊瑞梅(1988)及吳寶秀(1990)的臺灣製造業 1200 名員工的社會網絡，熊瑞梅(1991)在台中都會區 830 名居民的個人網絡是在探討都市化與個人網絡的關係性，及熊瑞梅(1992)在臺中都

會邊緣的個案社區中抽選250個居民做支持網絡的研究。

熊瑞梅(1988, 1991)在前兩個有關個人網絡研究的資料中, 祇請受訪者列出近半年來找誰談重大私事之網絡成員, 最多列五名成員, 並詢問網絡成員互動之密度, 且有網絡成員與受訪者的關係類型, 連繫強度、及網絡成員特質的資料。在熊瑞梅(1992)最近的個案社區研究中, 便把不同的支持類型網絡的概念放入, 選三個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三種類型支持: 情感支持、日常生活小幫忙、及財務支持, 每種支持類型最多均選三個人。這份資料比Wellman and Wortley(1990)的支持網絡研究資料在支持行動類型及網絡大小上均較小, 但資料的完整性相當夠。

王仕圖(1993)使用熊瑞梅(1992)的個人社區網絡資料所作的碩士論文發現在一個郊區社區的個人支持網絡中, 三種支持連繫分別占有支持連繫之比例為: 財務支持連繫占27.6%, 日常生活小幫忙連繫占43.5%, 情感支持連繫占44.5%。可見即使在人口快速成長流動的社區, 人們日常生活中仍然存在著大量具有情感及幫忙性的支持連繫。此外又發現平均每個受訪者所擁有的支持網絡人數為4.69人。其實都市化在臺灣社區並未摧毀人們最基本的情感及生活支持系統。同樣地由於交通發達, 地理親近性不會限制或破壞人們情感支持連繫的建立。

在影響不同支持連繫形成的因素上, 王仕圖(1993)發現對財物支持連繫形成機率有顯著影響的變項為支持者的性別、教育、收入、及職業, 受訪者與支持者的關係類型, 地理親近性, 與連繫強度。對幫忙支持連繫形成機率有影響之因素為支持者之性別, 地理親近性, 與連繫強度。對情感支持連繫形成機率有影響之因素為支持者的性別與宗教, 受訪者與支持者的關係類型與同質性, 及連繫強度。可見隨著都市化的社會變遷, 影響不同支持行動之因素不同, 親屬關係之遠近親疏已不是唯一影響日常生活支持行動之因素。

在有關中國社會或社區關係之解釋架構上, 常用費孝通(1949)的「差序格局」說。差序格局是中國鄉土社會人際往來的社會規範, 每個人與人往來時是依照父系親屬連帶關係的遠近來處理關係的親疏。他的差序格局觀是以

每個人為中心推衍出去的關係網絡，就此角度看與個人社區的觀點有類似之處。二者不同之處在前者乃規範觀，後者乃結構觀。所謂規範觀意指每個人與人關係親疏的距離，全是依照親屬遠近關係規範，換言之親近的關係必然是近親，不可能是由互動緊密的遠親或朋友取代之。而網絡分析是一種結構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也是一種結構社會學(Blau, 1982)。網絡式的結構觀是強調由實際互動網絡所形成的結構模式特質，才是對個人行動具有約束力的結構限制，而不贊成規範觀的規範社會化論。故網絡觀者認為個人網絡是由規範與互動交互影響形塑的網絡模式，故在個人支持網絡核心圈者未必全然是親屬，個人網絡形成是一個條件式、動態式、多重因素影響的結果。

在差序格局的規範觀中，完全忽略了二者特質的同／異質性對支持連繫之影響。許多研究發現同質性的關係易形成堅固的友誼關係，因為個人特質同質性代表二者價值興趣較一致，故較易產生了解且彼此支持(Feld, 1982; Marsden, 1988)。跨不同特質類屬之連繫代表異質性之關係，一般而言異質性的連繫是一種建立弱連繫的方式，而弱連繫較易達成工具型行動目的(Grannovetter, 1982; Lin, 1982)。

本研究針對過去的文獻已清楚地指出規範觀的限制，有關規範觀與結構觀的討論，本研究擬用實證分析結果於文後繼續討論。

三、研究方法

本論文資料是取自82年2月臺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的資料。本次意向調查有關支持行動的資源祇有兩大題，分別是：「最近幾年來，當你心理有煩惱時，你最常找誰談？」和「最近幾年來，和您最常有金錢往來的是誰？」。前者代表情感支持行動最重要的支持資源，後者則代表財務支持資源最顯著者。繼續再針對這兩種支持行動最重要的支持者進一步搜集特質、關係類型、及連繫強度等資訊。特質包括了性別、籍貫、年齡、教育程度、職業；關係類型有親屬與非親屬十三種類屬。連繫強度則包括居住地理親近性，打電話與見面的頻率則問：「平均而言，你和他多久聯絡一次？」。

社會意向調查由於包括的問題項目較多，有關支持行動的題目祇限受訪者選出過去生活經驗中曾提供情感支持及財物支持最顯著有意義的一個人及此人的相關資料。一個人日常生活中較多而且完整的支持網絡資料由於人力財力限制無法包括在此次的調查中。

本次意向調查1610名受訪者中，有20.4%的居民近年來沒有找人傾吐煩惱的經驗，而有46.3%的居民近年來沒有與人有金錢往來。表一顯示在實際的情感支持與財務支持連繫中，仍以選配偶為支持者的比例最高，分別為34.9%與15.7%。配偶與受訪者的獨立關係很難區分，唯恐在分析中干擾兩者支持連繫形成的影響因素，故在以後的分析中均剔除於外。

本研究綜合過去網絡連繫的理論文獻，將各種社會支持連繫形成的社會過程視為一個交換過程(Fischer, 1977; Wellman, 1982)。一種社會支持連繫的產生必然包括三個成份：需要支持者、提供支持者、前二者關係維繫的機制。需要支持者是指本次社會意向調查的受訪者，提供支持者是受訪者曾經尋求支持最重要的支持者，關係維繫機制包括受訪者與提供支持者之關係類型、連繫強度、與基本特質的同／異質性。一個支持連繫形成的機率被視為上述三個面向的因素造成的，上述三個面向的變數對不同支持連繫形成的機率會有不同的影響效果。例如需要支持者的基本特質對不同支持行動需要的機率是否有顯著不同之影響力？提供支持者的基本特質對不同支持行動提供的機率是否有顯著不同的影響力？二者關係類型、連繫強度及特質同／異質性的差異性對不同支持行動產生的機率是否有不同的影響力。上述提出的問題便是本研究擬透過實證分析探索的研究假設。

在分析時本研究所用到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包括：性別、年齡、籍貫、婚姻地位、教育、職業、從業身份、及現居地都市化程度。現居地都市化程度的分類是依據伊慶春主持的社會意向調查所設定的鄉鎮區都市化程度分類標準：核心都市、一般都市、城鎮、鄉村。至於支持行動提供者的特質包括性別、籍貫、年齡、教育、職業。在分析時使用的同／異質性指標，是比較受訪者特質與提供支持者特質的差異，這些特質包括性別、年齡、籍貫、

表一 情感支持行動、財務支持行動最常由誰提供的次數百分比分配表

	情感支持行動	財務支持行動
配 偶	34.9	15.7
父 親	1.4	4.4
母 親	7.5	6.3
兒 子	1.4	1.3
女 兒	2.1	0.7
兄弟姐妹	5.8	9.2
其他親戚	0.9	2.2
同 事	1.5	1.4
鄰 居	1.2	0.7
朋 友	20.1	11.1
同 學	2.7	0.7
同 鄉	0.0	0.0
同社團	0.1	0.0
不適用	19.4	45.5
其 他	0.9	0.7
遺漏值	0.1	0.1
總次數	1610	1610

教育、與職業。在某些特質上，若支持需要者與提供者是相同類屬，則是同質，不同類屬則為異質性，同／異性的變項放在邏輯迴歸分析中，同質過錄為0，異質過錄為1。

首先本研究用描述性的交叉分析找出需要支持者之特質、提供支持者之特質、及關係維繫之機制與不同的支持連繫是否有顯著關聯。故在第一步驟描述性分析中，分別就支持行動的1228個連繫，將兩種支持行動兼具，祇有

情感支持、祇有財務支持等三種模式與支持連繫需要者的特質，提供支持資源者的特質，及關係連繫的維持機制等三個層面變項做交叉分析。

本論文針對支持行動類型與支持行動需要者特質，提供支持者之特質，及二者關係維持之機制分別做了交叉分析；支持行動的需要者特質，提供支持者特質，及關係維持機制均有與支持行動類型有關連的變項。本論文擬在最後一部份分析，設法用上述三面向有顯著關連的變項找出較能區別或解釋情感支持行動與財務支持行動的影響變項，由於許多獨立變項及依賴變項均是類別變項，故較適合邏輯迴歸分析。

四、研究結果

1. 需要支持者的特質與不同支持行動類型之關聯性

需要支持行動者的特質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籍貫、教育、職業、從業身份、及都市化類型。這些需要支持行動者的特質會與支持行動的類型有何關連？需要支持行動者的性別、婚姻狀況、職業、及從業身份與支持行動的類型有關，但需要支持行動者的年齡、籍貫、職業、及都市化類型均與支持行動的類型無關連(表二)。

情感與財務支持行動重疊的連繫(ties)，由男性受訪者所需要的支持連繫中有9.1%是具有情感與財物支持功能之連繫，而由女性受訪者所需要的支持連繫中有7.9%是具有情感與財物支持功能之連繫。男性需要支持行動者與女性最大的差異是，男性偏向需要財務支持行動，而女性偏向需要情感支持行動。在男性需要的所有支持連繫中，僅是財務支持的連繫佔49.0%，而僅是感情支持的連繫佔41.9%；反之，由女性需要的支持連繫中，僅是情感支持的連繫佔57.0%，而僅是財務支持的連繫佔46.0%。

需要支持行動者的婚姻狀況與支持行動有顯著關連。表二中顯示未婚、離婚、及喪偶者均較已婚者需要情感支持的比例較高，尤其是喪偶者所啓動的支持連繫中，僅屬於情感支持連繫的比例便佔所有支持連繫的71.2%。喪偶者特別需要情感支持，由此可見。

表二 支持行動需要者之特質與支持行動類型之交叉分析

		情感與財務兼具	僅有情感支持	僅有財務支持	總次數
性別					
	男	9.0%	41.9%	49.0%	561
	女	7.9%	57.0%	35.1%	667
			$\chi^2=28.69$	$p<.001$	
婚姻					
	已婚	7.6	46.7	45.6	723
	未婚	9.7	53.1	37.2	422
	離婚	13.8	51.7	34.5	29
	喪偶	5.8	71.2	23.1	52
			$\chi^2=19.46$	$p<.01$	
職業					
	專業人員	5.0	52.1	42.9	119
	行政主管人員	12.3	38.6	49.1	57
	佐理人員	5.2	49.6	45.2	135
	買賣人員	11.3	43.4	45.3	159
	服務人員	6.7	50.0	43.3	60
	農漁牧人員	7.2	49.5	43.3	97
	工人	10.1	44.1	45.8	227
	未就業勞動力	8.6	58.0	33.4	374
			$\chi^2=25.90$	$p<.05$	
從業身份					
	自雇者	9.4	42.6	48.1	310
	公營機構受雇者	2.6	55.7	41.7	115
	私營機構受雇者	8.7	48.5	42.8	435
	未就業勞動力	9.2	56.5	34.2	368
			$\chi^2=22.68$	$p<.001$	

就支持行動需要者的職業而言，專業人員、佐理人員、服務人員、農人、及家庭主婦及未就業之勞動力者均需要情感支持的連繫超過財務支持的連繫。行政管理人員與其他職業不同，行政管理者需要財務支持行動連繫的比例遠超過情感支持行動連繫之比例。

若就需要支持行動者的從業身份而言，自雇者身份與公營機構受雇者，私營機構受雇者，及家庭主婦等未就業之勞動力者之支持行動模式不同。自雇身份者需要財務支持行動連繫之比例較情感支持連繫為高。

2. 提供支持者之特質與不同支持行動類型之關聯性

一個支持行動的形成，不祇是因有人需要支持行動，同時更需要有人願意提供此支持資源，故提供某類型支持行動者，往往也被視為其擁有某類型的支持資源。

本次意向調查，有關提供支持行動者的特質變項包括性別、年齡、籍貫、教育、職業。不同種類的支持行動類型是由那種特質的人提供，是此部份分析的重點。除了提供支持行動者的籍貫外，提供支持行動者其他特質變項與所提供的支持行動類型均有關(表三)。

性別代表不同類型的支持資源，在Wellman and Wortley(1990)的論文中已很精緻深入地討論性別支持資源的意義。在本研究中也發現，由男性所提供的543個支持連繫中，有53.6%是僅提供財務支持，而37.9%是僅提供情感支持；反之，由女性提供者所提供的682個連繫中，有59.8%是僅提供情感支持，31.7%是僅提供財務支持。顯然男性在社會資源分配中代表擁有較豐富有力的工具資源，故比女性更易成為工具性支持資源的提供者；而女性則擁有較豐富的情感資源，故較男性更易成為情感支持行動的提供者。顯然，這種性別社會資源的分化是有其普遍化的基礎。

就年齡的社會支持資源分化狀況而言，很明顯地出現老、中、青不同生命循環階段的資源分化差異模式。就青年人(40歲以下)及老年人(60歲以上)而言，均屬經濟條件較差的羣體，擁有財務支持資源的能力不如中年人(40-50歲)，故青年人與老年人所提供的支持連繫中，提供財務支持連繫比例

表三 支持行動提供者之特質與支持行動類型之交叉分析

		情感與財務兼具	僅有情感支持	僅有財務支持	總次數
性別					
	男	8.5%	37.9	53.6	534
	女	8.5	59.8	31.7	682
			$\chi^2=64.43$	$p<.001$	
年齡					
	小於30歲	11.2	65.3	23.5	268
	30-39	6.2	50.4	43.3	353
	40-49	8.0	41.8	50.2	237
	50-59	6.9	42.0	51.1	188
	大於60歲	11.4	46.0	42.6	176
			$\chi^2=57.65$	$p<.001$	
教育					
	小學以下	10.6	41.0	48.4	395
	初 中	6.8	51.0	42.2	192
	高 中	9.1	51.9	38.9	339
	專科以上	6.7	61.0	32.2	267
			$\chi^2=27.77$	$p<.001$	
職業					
	專業人員	9.6	56.7	33.7	104
	行政主管人員	6.7	29.3	64.0	75
	佐理人員	9.5	66.7	23.8	105
	買賣人員	4.8	50.3	44.8	145
	服務人員	11.5	46.2	42.3	52
	農漁牧人員	11.5	35.4	53.1	96
	工 人	8.8	45.0	46.3	160
	未就業勞動力	8.5	53.3	38.0	484
			$\chi^2=49.53$	$p<.001$	

較提供情感支持連繫低。對30歲以下的青年人而言，事業尚未成，擁有財務資源有限，故其所提供的支持連繫，相對地以情感支持連繫比例特別高，小於30歲者所提供的支持連繫中高達65.3%是僅具提供情感支持功能的連繫。

教育程度愈高者，所提供的支持連繫中，情感支持連繫的比例有愈高的趨勢。教育程度是小學以下的支持行動提供者所提供的連繫，以財務支持提供之連繫比例較高。例如：對專科以上的支持行動提供者而言，他們所提供的支持連繫中，就高達61.0%的連繫是僅具情感支持功能；而對小學以下的支持提供者而言，他們所提供的支持連繫有兩個特徵，一個是多功能的支持資源提供者，他們提供的支持連繫中，情感與支持功能兼具的連繫高達10.6%，而僅具財務支持功能的連繫佔48.4%，僅具情感支持功能的連繫佔41.0%。

就提供支持行動者的職業而言，行政主管及農漁牧業的支持資源提供者，其所提供的支持類型模式與其他職業的支持行動提供者大不相同。行政主管人員及農漁牧業者所提供的支持連繫，很明顯地財務支持連繫較情感支持連繫為多；除工人外，其餘職業支持行動提供者所提供的連繫以情感支持較財務支持為多。行政主管人員在職業聲望上較高，也較擁有財務資源，在生活上不但常需要與人有金錢往來，且也常提供人財務上的支助。

3. 維持支持連繫的機制與不同支持行動類型之關聯性

一個支持行動的形成，除了因為有人需要，有人提供外，所有支持行動均是一個二者社會關係的連繫，支持行動的需要者與提供者之間的關係類型為何？二者關係連繫強度為何？二者支持關係形成是否奠基於同質性法則？均是維持支持連繫的機制，也是本部份分析的重點。

(1) 關係類型

不同關係，提供不同的支持行動。在親屬當中，不同類型的親屬，提供的不同的支持行動。父親、兄弟、與其他親戚明顯地提供財務支持行動較情感行動為多。母親與女兒均是提供情感支持較財務支持為多的連繫。在這些親屬關係類型與支持類型間的關連中，可發現，本調查中所呈現與 Wellman and Wortley(1990) 研究中不同之處，是臺灣親屬關係提供的支持較多，一般

而言，西方社會除了父母子女垂直軸的親屬關係較可能提供財務支持外，其他各種關係，在財務支持方面均不重要。但本研究中，不但父母在財務支持上很重要，兄弟姐妹，及其他親戚在財務支持上更為重要，可見，在臺灣家庭中，工具性行動在親屬網絡中可使用的資源範圍較西方為廣(表四)。

在非親屬的關係(同事、鄰居、朋友、同學)中，所提供的支持連繫均以情感連繫為多。鄰居、朋友及同學關係較傾向於提供情感支持，而同事關係提供的財務支持較其他非親屬關係為高。

(2) 連繫強度

二者關係的連繫強度在本次意向調查中，包括認識久暫性、聯絡頻率及地理親近性，在聯絡頻率上又分成電話及見面的頻率兩方面。若將代表連繫強度的指標分別與支持行動類型做交叉分析，僅有電話聯絡頻率與支持行動類型有關連。表四中顯示70.4%的連繫是每星期有一、兩次以上的溝通機會，其中21.8%是住在一起，而14.1%每天通電話，34.5%是每星期有一、兩次電話聯絡。最強及最弱的連繫提供財務支持的傾向較強，住在一起者多半是親屬，住在一起的連繫中有45.0%是僅具財務支持功能，而有42.6%是僅具情感支持功能，幾乎沒有通電話的連繫，有47.7%具財務支持功能。若每個月通電話一、兩次，好幾個月通一次，或幾乎沒有通電話的連繫視為較弱的連繫，很明顯地可看出，弱連繫所能提供的支持是單一的，不具多重功能；反之，住在一起及幾乎每天通電話的強連繫，具有提供情感與財務支持雙重功能的比例也特別高。本研究中支持行動提供者與需要者的空間距離接近程度與支持行動類型無關連。

(3) 支持行動的需要者與提供者之同質性

二者性別、年齡、教育、職業之同質性與支持行動的類型有關連，但籍貫同質性則與支持行動類型無關。表四顯示性別異質性傾向於形成財務支持行動(59.6%)，而性別同質性的連繫，具情感性支持功能的連繫比例較高(54.9%)。教育、年齡、職業同質性與支持類型的模式均與性別同質性類似，異質性的關係連繫較具財務支持功能，而同質性的關係連繫較具情感支持功

表四 關係維持機制與支持行動類型之交叉分析

關係類型		情感與財務兼具	僅有情感支持	僅有財務支持	總次數
父親	6.8*	19.3	73.9	88	
母親	11.6	48.7	39.7	199	
兒子	10.3	46.2	43.6	39	
女兒	9.5	71.4	19.0	42	
兄弟	3.3	22.8	73.9	92	
姐妹	9.7	42.5	47.8	134	
其他親戚	6.4	23.4	70.2	47	
同學鄰居同事	5.6	64.0	30.4	125	
朋友	8.9	61.4	29.7	461	
		$\chi^2=131.27$	$p<.001$		
連繫強度—電話聯絡					
住在一起	12.4	42.6	45.0	258	
幾乎每天	12.0	50.9	37.1	167	
每星期一、兩次	8.1	55.9	36.0	408	
每個月一、兩次	4.4	48.8	46.8	205	
好幾個月一次	5.4	51.8	42.9	56	
幾乎沒有	4.5	47.7	47.7	88	
		$\chi^2=26.49$	$p<.01$		
同質性					
性別					
異	6.0	34.4	59.6	285	
同	9.3	54.9	35.9	940	
		$\chi^2=50.48$	$p<.001$		
年齡					
異	8.0	44.8	47.2	659	
同	9.0	56.2	34.8	569	
		$\chi^2=19.75$	$p<.001$		
教育					
異	8.3	43.9	47.8	601	
同	8.6	56.0	35.4	627	
		$\chi^2=20.27$	$p<.001$		
職業					
異	7.2	46.3	46.6	726	
同	10.5	56.0	33.5	495	
		$\chi^2=21.61$	$p<.001$		

能。

4. 影響支持行動類型的邏輯迴歸分析

表五的邏輯迴歸分析包括了三個邏輯迴歸方程式，第一個是區別情感與財務支持類型之方程式。因為在所有1228個支持連繫中有104個連繫是具有情感支持與財務支持雙重功能，這些連繫沒有獨立特性，故在第一個邏輯迴歸分析中剔除，剩下的1124個連繫，分別是僅具財務支持功能或僅具情感支持功能之連繫。

在邏輯迴歸的分析中，依賴變項是支持行動的類型—情感支持連繫及財務支持連繫，分別過錄為0和1。解釋變項則包括了支持行動需要者特質，提供支持行動者之特質，及二者關係維持機制的變項。第二和第三個方程式則分別是強調解釋情感支持或解釋財務支持的方程式，故此二方程式包括了具雙重支持功能的104個連繫，在第二個解釋情感支持行動類型的方程式中，這104個重疊的連繫均過錄為情感連繫值1，其餘僅具財務功能的連繫則過錄為0；在第三個解釋財務支持行動類型的方程式中這104個重疊的連繫均過錄為財務連繫值1，其餘僅具情感功能的連繫則過錄為0。表五顯示三個方程式具顯著解釋力的變項很類似。

在解釋情感或支持行動形成的機率邏輯迴歸模型中，解釋變項分三個部份：需要支持者的特質、提供支持者的特質、及關係維繫的機制。在前面部份的交叉分析中，凡與支持行動的類型有顯著關連的變項，均納入邏輯迴歸模型的獨立變項中。做邏輯迴歸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企圖找出這些原來與支持行動有關連的變項，當控制其他變項後，這些變項獨立解釋支持行動類型的機率是否仍然顯著。

在處理獨立變項中的類別時，為減少類屬，又不破壞類屬中在情感與支持行動的分佈模式，各變項重組的狀況正如表五邏輯迴歸分析解釋變項中的類屬，各變項中未出現的類屬，則為虛擬變項設定時的對照類屬。

就需要支持者的特質而言，僅有婚姻與職業對支持行動類型的機率還有顯著解釋力。離婚及喪偶者較已婚者對財務支持行動的需要顯著地低；換言

表五 區別及解釋情感或財務支持行動機率的邏輯迴歸分析未標準化邏輯迴歸係數

解釋變項	1情感/財務(0, 1)	2情感	3財務
需要支持者之特質			
未婚	-.176	.207	-.092
離婚、喪偶	-.596*	.673*	-.605*
專業人員	.629**	-.653**	.432#
行政主管人員	.389	-.255	.417
佐理人員	.840***	-.887***	.623**
商業服務人員	.572**	-.488**	.534**
農漁牧工人	.249	-.223	.176
提供支持者之特質			
男	1.220***	-1.116***	1.082***
40-59歲	.317#	-.327*	.268#
60歲以上	-.089	.124	.012
初、高中	-.429**	.325#	-.419**
大專及以上	-.908***	.776***	-.886***
專業人員	-.006	.077	.098
行政主管人員	.568#	-.579#	.557#
佐理人員	-.648*	.627*	-.355
商業服務人員	-.161	.102	-.113
農漁牧工人	-.090	.109	-.008
關係維持之機制			
父母子女	.725***	-.697***	.652***
兄弟姐妹	1.515***	-1.448***	1.354***
其他親戚	1.864***	-1.696***	1.588***
性別異質性	.836***	-.882***	.664***
電話每星期 二次以上	-.373*	.449**	-.184
次 數	1124	1228	1228

- 1、去除重覆的CASE
- 2、將情感支持當1
- 3、將財務支持當1

***P< .001 , **P< .01 , *P< 0.5 , # P< .10

之，離婚及喪偶者相對地較傾向於需要情感支持。在各種職業中僅有佐理人員相對於未就業的家庭主婦及學生而言，有較高的機率會需要財務支持。

就提供支持資源者而言，提供支持者的性別、年齡、教育、及職業對解釋支持行動類型的機率均有顯著解釋力。男性比女性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高，40至59歲的支持資源提供者較40歲以下者有較高的機率提供財務支持，初中及高中、和大專以上者均較小學及以下者更不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尤其是大專以上者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最低。提供支持者的職業僅有佐理人員顯著地較未就業者更不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相對地是傾向於提供情感支持；雖然行政主管人員的解釋力不太顯著，但很明顯地相對於其他職業，行政主管人員較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

在關係維繫的機制中，關係類型、性別同質性、及電話聯絡的頻率對支持行動類型機率的解釋力具有顯著效果。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親屬均較非親屬更易提供財務支持行動。其他親屬，及兄弟姐妹在支持行動類型的區別上，相對地更顯著地傾向於財務支持行動之提供，這種現象明顯地與西方社會財務支持連繫機制不同，西方社會除父母為主要的支持資源外，其餘親屬均無顯著財務支持效果。二者性別異質性被過錄為1，同質被過錄為0，表五邏輯分析顯示二者不同性別之關係較同性別之關係更多機率會產生財務行動，反之不同性別之關係較不易形成情感支持之行動。經常通電話聯絡的連繫頻率(住在一起、每天、或每個星期一、兩次)比不常通電話(每個月一、兩次，好幾個月一次，及幾乎沒有)較不傾向於成為財務支持的行動，相對地較傾向於成為情感性的支持行動。

五、結論與討論

本次社會意向調查，問卷中所設計的網絡資料，是典型的個人網絡設計形式。個人網絡問題項目第一次出現在美國全國性的調查問卷項目中，是在1985年全國意見調查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所主持的一般性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內。個人網絡項目設計的優點是它可將

網絡資料之蒐集適用在大樣本上。一般在問卷中設計個人網絡項目時，要考慮的問題面向有：要如何套出受訪者的網絡？要如何掌握網絡關係形成之基礎？針對第一個問題，美國1985年調查中是用情感支持行動來套出網絡，同時一個網絡最多限制提出5個人名，此外還問了上述5個人彼此之間的關係是親近還是陌生的關係網絡資料。至於第二個問題，網絡關係形成的基礎包括受訪者與提供支持者之二者關係(dyadic relation)的關係內容、連繫強度、關係同質性、及地理親近性。由於此次意向調查不是以網絡為專題，故研究設計是以簡化網絡但不失網絡內容為原則。本次調查在有關支持網絡資料，祇問了最重要的情感支持者及財務支持者與受訪者的關係、連繫強度、關係同質性、及地理親近性等訊息。缺少了網絡結構的資料，整個分析不能做網絡大小、網絡密度、異質性、組成等網絡結構層次的分析。故本研究所有分析是以支持行動連繫(tie)為單位之分析。

Wellman and Wortley(1990)在加拿大的East York研究中支持行動的類型有18種，每種支持行動不限人數，Van der Pole(1992)在荷蘭的抽樣調查中，問10個有關3種支持行動類型(情感、工具、及友伴)的問題，每個問題提供支持者的名單最多5人。但在本研究中，提供情感或財務支持行動者均祇限一名最常提供此項支持行動者。由於資源的測量方式不同，故解釋與比較要特別小心。

Wellman and Wortley(1990)資料有33個個人網絡，共有403個連繫(ties)，此403個連繫有些是提供單一支持資源，有些連繫是具多重支持功能。基本上Wellman等人(1990)是掌握了一個個案社區少數樣本較完整的支持行動系統。由於他的支持行動類型包括了五大類，故在所有的支持連繫中，財務支持行動佔所有支持連繫相對地比例會較低。

反之，本次意向調查所詢問的支持行動祇有兩種，每種支持行動最多選一人，故在以連繫為分析單位時，連繫所代表的支持系統總共的連繫次數必然低估；但若一個大型調查中，在有關支持行動的篇幅有限的情況下，以這兩種支持行動類型去探討「不同支持來自不同人」(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Wellman and Wortley, 1990)，還相當有效，因為這兩種支持行動重疊性不高，又具區別性，正可滿足本研究的主題關懷：是否不同的支持行動，來自不同特質的人，也奠基於不同的關係機制。在Wellman and Wortley(1990)的五大類型的支持連繫中，情感支持、服務支持及同伴支持重疊部份多，且以情感支持最重要，財務支持與找工作與房子支持均屬工具性支持，但以財務支持連繫比例較高；故若日後要用調查形式做有關支持行動的關係基礎研究，祇以情感及財務支持行動做指標，仍然有其效度。

本研究除了在測量方法上做反省外，對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擬進一步地做理論性的討論。有關個人網絡資源分析所使用的理論詮釋，由Fischer(1977)的限制選擇論，漸漸地發展到Wellman(1988)的資源分化論。其實不論是限制選擇論或資源分化論，個人網絡行動的形成均使用社會交換論的社會互動機制說明之。本研究便是按照社會交換原理將支持行動形成分成三個成份：需要支持者的特質、提供支持者的特質、互動關係資源交換關係維繫之機制。

在三個影響支持行動形成的層面中，支持行動需要者的特質對支持行動類型有解釋力的變項較少。僅有離婚及喪偶者對情感支持行動的需求特別強，及佐理人員較未就業者需要財務支持行動。在Wellman and Wortley(1990)研究，及本人在曉蘭社區的研究(熊瑞梅，1992；王仕圖，1993)均顯示受訪者的個人特質，對選取某類型支持行動上的機率並無影響，亦即不論居住城市鄉村，不論位居那種結構位置者，其對各種類型的支持行動需要是一種隨機分配的模式，各種特質的人對各種不同類型的支持行動需要差異不大。本研究除了少數結構特質者外，例如離婚、喪偶者，其餘結構位置者對支持行動之需要大致與其他研究發現無異。

不論是居任何空間或社會結構位置的人們，顯然他們對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財務支持或情感支持的需要是沒有太大的差異。這樣的研究發現到底有哪些理論意涵？空間結構對人們需要哪種社會支持沒有影響，此意謂空間決定論的無效性。Fischer(1982)與Wellman(1982)用個人社區(personal community)的概念來批判都市衰敗論的說法，都市衰敗論強調都市化與人際

關係的疏離有關連，亦即假設大都市的居民必然比鄉鎮的居民更冷漠，更不需要或得不到社會支持。事實上，我們若用人們親密支持網絡所組成的個人社區來看都市化與人際關係的變遷，本研究結果似乎較支持Fischer(1982)的說法，亦即社會變遷並未改變人們最親密、核心、且具支持性的社會網絡，不論住在鄉村或都市者，人人都需要最基本的親密支持，只是個人親密支持網絡關係隨著都市化的結果，不再限於地方社區內。

至於社會結構位置對不同類型支持的需要也無顯著影響，此意謂著社會各個結構位置者，均不可避免地，同樣地也需要不同的支持。顯然人人需要社會支持，但不同的支持行動是否能形成則受制於關係的因素。不同支持行動是由誰提供，或透過甚麼關係機制，均是支持行動形成的社會基礎。例如：有人需要情感或財務支持，但支持行動的形成最重要的是那種人會提供那些類型的支持。而支持行動者的特質被視為結構位置所擁有的資源。本研究發現支持行動提供者之性別、年齡、教育、及職業對支持行動類型均有影響，但以性別及教育影響較顯著，這個研究發現與本人在曉蘭社區的發現類似，亦即性別及教育資源分化的狀況如下：男性較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資源，而女性較傾向於提供情感支持資源；在本研究中低教育較易提供財務支持資源，而高教育較易提供情感支持資源。在Wellman and Wortley(1990)的研究中，提供支持者的特質對支持類型的解釋，唯一有顯著性的是性別資源，男性傾向於提供工具性行動支持，女性傾向於提供情感性支持行動。在本研究及曉蘭社區中均呈顯低教育者比中、高教育者較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資源，此是否意謂著低教育的經濟支持系統傾向於使用非正式的網絡，而中高教育的經濟支持系統較仰賴正式金融系統的借貸，故在低教育階層中較易形成以社會關係網絡為基礎所發展的財務支持系統，但這種假設無法用量化分析表現出來，必須用深度訪談的質化資料，始可找出支持上述論證的社會事實。

有關中國社會關係結構最盛行的詮釋方式是採費孝通(1949)的差序格局說法，亦即中國人行事是依對方與自己的關係遠近親疏而定，這種對日常生活行動的詮釋是採規範觀，預設中國人對人與人的關係均能清楚地瞭解彼此

關係的遠近親疏，進而針對不同關係，採取不同行動內容的行動結構模式。事實上，這種規範觀在都市化程度高的臺灣社會不盡適當，因為差序格局的互動模式部份仍存在，但社會關係的遠近親疏未必是依循一成不變的倫理規範，除受較固定的關係類型影響外，是否經常連絡的連繫強度，及任何兩者同／異質性所造成的互動吸引力均可能是影響現代社會互動之機制。連繫強度與二者之同／異質性較強調二者關係理性選擇的原理，而前者關係類型較強調關係角色規範的支持行動解釋。

在關係建立的機制中，本研究發現關係類型，性別同／異質性及連繫強度均能解釋支持行動的類型機率。而其中解釋力最強的是關係類型；本研究發現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及其他親屬是比較傾向於提供財務支持的連繫；反之，非親屬的朋友、同事、鄰居、同學則傾向於是情感支持行動提供之連繫。此研究發現與本人曉蘭社區支持行動研究結果相似。與Wellman and Wortley(1990)研究相同之處是父母子女關係連繫是唯一提供財務支持的關係連繫，在本次社會意向調查資料顯示，臺灣社會兄弟姐妹及其他親屬連繫提供財務支持行動的機率甚至比父母子女關係連繫尚高，此乃東西方社會最不同之處。西方社會是以父母與子女為支持主軸的核心家庭，而臺灣社會雖然因為都市化的緣故，父母子女、已婚兄弟姐妹、其他親屬未必住在一起，但從財務的支持行動上，可看出擴大家庭的支持模式。但無法顯示差序格局的模式，因為其他親屬及兄弟姐妹提供財務支持的機率並不比父母低。亦即無法看出親屬遠近關係對支持行動提供有機率上的差異性。

在西方社會父母與子女方面的支持義務規範仍強，但兄弟姐妹或其他親屬，提供簡單服務或情感支持尚可，若借錢則免談(Wellman and Wortley, 1989: 294)。反之，在臺灣社會依賴父母、兄弟姐妹、及其他親戚等社會親屬網絡的財務支持系統甚強，此或許可做為臺灣中小企業在資金調度上仰賴親屬網絡的經驗佐證(陳介玄與高承恕，1992；謝國雄，1990)。

本研究有關連繫強度的三種指標：(1)居住親近性，(2)電話聯絡頻率，(3)見面頻率中，以電話聯絡頻率是唯一能解釋支持類型機率的變項，這種

研究發現與 Wellman and Wortley(1990) 的研究結果相似，由於本人在曉蘭社區研究中未放入電話聯絡變項，故無法比較。Wellman and Wortley(1990) 認為見面頻率，有時是不期而遇，或環境可接近性，但電話接觸則是互動雙方志願性的互動行動，故更能測出二者關係形成的基礎。在 Wellman and Wortley(1990) 研究中電話聯絡頻率與情感支持有相關，但在邏輯分析中，控制其他變項中，常常電話聯絡之連繫傾向於提供情感支持。

本研究支持行動需要者與提供者之特質同／異質性能解釋支持行動類型者祇有性別異／同質性，性別相同之連繫較易提供情感支持，而性別相異之連繫較易提供財務支持，這種研究結果與 Wellman and Wortley(1990) 發現大致相同，他們的研究發現性別、年齡同質性有助於提供情感支持行動。換言之，同性別之關係較易形成情感資源，不同性別之間的關係較易形成工具性的資源。

本研究資料祇限於說明支持行動連繫(ties)形成的基礎，由於支持類型不夠多，每種支持類型的支持者不完整，故研究結果是不能推論到支持網絡系統的結構特徵及運作原理，若欲掌握支持網絡系統資源，必須每個受訪者套出較多的支持關係，網絡成員間的關係密度，網絡成員的特質，網絡成員與受訪者之關係、連繫強度、與地理親近性。若未來擬作個人支持網絡之專題研究，最好能加入深入訪問資料，如此纔能對支持關係形成的動態過程有深入的瞭解。

(收稿日期：1993年11月6日；接受刊登日期：1994年4月22日)

參考資料

王仕圖

1993 「快速成長的郊區社區之居民支持網絡與社區情感之研究—以『曉

蘭社區』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伊慶春

1985 都市社會網絡與地緣關係之研究—以臺北為例，探討都會區社區發展方向與社區組織系統，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1988 「臺北市的社區類別與鄰里關係」，**臺大社會學刊** 19: 77-98。

伊慶春、章英華

1989 「都市意象：以臺北市居民為例的探討」，**中國社會學刊** 13: 43-66。

吳寶秀

1990 「臺灣製造業員工個人社會網絡分析」，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孫清山

1979 「都市社區的閭鄰社會關係」，**科學發展月刊** 7(11): 1147-1165。

孫清山、熊瑞梅

1988 社會資源與社會流動，國科會專題計畫。

章英華

1988 「都會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變遷中的臺灣社會**，楊國樞、瞿海源(主編)，頁159-194。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陳介玄、高承恕

1991 「臺灣企業運作的社會秩序—人情關係與法律」，**東海學報** 32: 219-232。

黃清高

1985a 都市社會網絡與地緣關係之研究—臺北都會區發展方向探討與社區組織系統設計，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b 都市居民社會網絡之研究」，**思與言** 23(3): 35-62。

費孝通

1949 **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上海：觀察社。

熊瑞梅

- 1991 社會資源、社會流動與居住流動，國科會專題計畫。
 1992 快速成長的郊區之菁英影響力結構及居民社會資源，國科會專題計畫。

謝國雄

- 1989 「黑手變頭家—臺灣製造業中的階級流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2(2): 11-541。

Aneshensel, C.S. and R.R. Frerichs

- 1982 "Stress, Support, and Depression: A Longitudinal Causal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0 (4): 363-376.

Blau, Peter

- 1982 "Structural Sociology and Network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Marsden, P. V. and Nan Lin(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Feld, Scott

- 1982 "Social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Similarity among Associ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Dec.): 797-801.

Fischer, Claude S.

- 1977 *Networks and Places: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Urban Set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ns, Herbert

- 1982 *The Urban Villagers*. The Free Press.

Granovetter, Mark

-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 1982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in Peter Marsden and Nan Lin(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Granovetter, Marks S.

-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481-510.

House, J. S.

- 1981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Hunter, Albert

- 1975 "The Loss of Community: An Empirical Test Through Repl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0(Oct.): 537-552.

Kadushin, Charles

- 1981 "Notes on expectations of Reward in N-person Networks," in Peter Blau and Robert Merton(eds.), *Continuities in Structural Inquir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Kasarda, John D. and Morris Janowitz

-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328-349.

Lin, Nan

-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 Marsden and N. Lin(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1986 "Conceptualizing Social Support," in Nan Lin, Alfred Dean, and Walter M. Ensel(eds.),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on*. Academic Press, Inc..

Marsden, Peter

-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122-131.

1988 "Homogeneity in Confiding Relations," *Social Networks* 10: 57-76.

Perlin, L. I.

1984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upport," in Sheldon Cohen and Leonard Syme(eds.),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Van der Poel, Mart G. M.

1992 "Building Personal Network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r Personal Preferences," The XII International Sunbelt Network Conference, San Diego, CA., U.S.A.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5: 49-70.

Verbrugge, Lois

1977 "The Structure of Adult Friendship Choices," *Social Forces* 56: 576-597.

Wellman, Barry

1981 "Applying Network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Support," in B.H. Gottlieb(ed.),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Support*.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Studying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Petre Marsden and Nan Lin(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88 "The Community Question Re-evaluated," in Michael Peter Smith(ed.), *Power, Community and the Cit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2 "Men in Networks: Private Communities, Domestic Friendships," in Peter Nardi(ed.), *Men's Friendship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Wellman, Barry and Barry Leighton

- 1979 "Networks,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ies: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Question,"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15: 363-390.

Wellman, Barry and Scot Wortley

- 1989 "Brothers' Keepers: Situating Kinship Relations in Broader Networks of Social Support,"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2(3): 273-306.
- 1990 "Different Strokes from Different Folks: Community Ties and Social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3): 558-588.

Wellman, Barry, Peter J. Carrington, and Alan Hall

- 1991 "Networks as Personal Communities," in Barry Wellman and S. D. Berkowitz(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Cambridge Press.

The Factors Affecting Emotional or Financial Support Ties

Ray-may Hsu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1228 intimate ties of emotion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studied in a nationwide Taiwanese survey. It foun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pport providers and the maintenance mechanism of relationship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demanding the support in explaining the probability of forming emotional or financial support ties. Sex and education represent differential positional resources. Men tend to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and women tend to provide more emotional support. Highly educated people tend to provide more emotional support, and less educated people tend to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The content of relationships, the strength of ties, and the similarity of characteristics are components of maintenance mechanism of relationship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aiwan is the content of relationships: kin tend to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and nonkin tend to provide more emotional support. The financial support ties of kin are much stronger than Wellamn and Wortley found (1989, 1990). Parents-children, brothers-sisters, and other kin all significantly provide more financial support ties than emotional support ties.